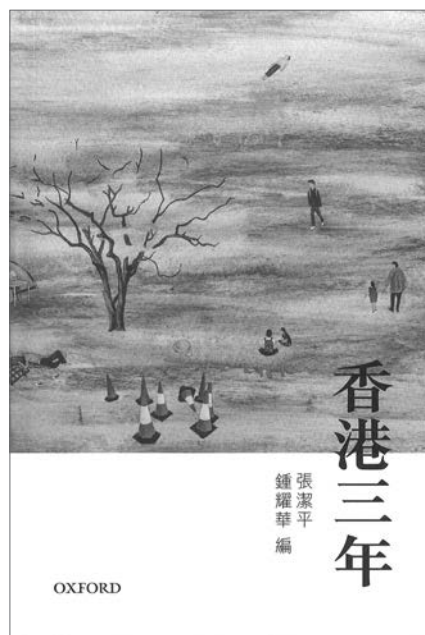


# 歷史轉折中的香港

——評張潔平、鍾耀華編《香港三年》

● 嚴 飛

《香港三年》一書聚焦2013年初到2016年初這三年中，香港身處劇烈的政治變局衝擊之下，從「佔領中環」、「雨傘運動」再到旺角暴力騷亂，新的社會及政治運動模式、新的政治勢力、新的身份認同如何出現、發展，並走向分裂的過程。



張潔平、鍾耀華編：《香港三年》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

「這是埋藏了30年的懸念揭幕的時刻。香港2017年到底能否如人大在2007年承諾的那樣，爭來民主普選？幕布背後是北京的答案，答案背後卻牽動着這座城市累積多年的民情變化、世代更迭、以及人心向背。」這是《香港三年》(引

用只註頁碼)一書中的重要提問(頁34)。答案在今天早已揭曉，不過答案背後的民情變化、世代更迭和人心向背卻依舊如暗潮般，激烈地翻滾着。

《香港三年》由《端傳媒》主編張潔平和前編輯鍾耀華編著，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端傳媒》記者的深入報導，是「作為媒體工作者盡己所能的推進與梳理」(頁x)。全書共分兩大部分，收錄四十二篇文章，包括張潔平的「攤牌」系列、陳健民的〈革命的誘惑〉、練乙錚的〈暴力邊緣論——三派抗爭路線的可能匯合點〉等多篇重要論述。其中第一部分「反對運動的集結與分裂」，聚焦2013年初到2016年初這三年中，香港身處劇烈的政治變局衝擊之下，從「佔領中環」、「雨傘運動」再到旺角暴力騷亂，新的社會及政治運動模式、新的政治勢力、新的身份認同如何出現、發展，並走向分裂的過程。第二部分「香港的記憶戰場與拾遺」，則將關注的焦點從過去三年延伸到三十年(1983年中英談判為起點的80年

代)的歷史縱深之下，深度剖析今日香港民主政治所埋下的諸多問題是否有其歷史的根源；在歷史的延展中，身處其間的人們的命運又是否有其相似性。

## 一 「中生代」的香港夢想

《香港三年》的編者之一張潔平，是一位典型的「中生代」香港人。所謂「中生代」，意即在中國大陸出生，赴港讀書工作繼而留港的新一代香港人。在此獨特身份背景之下，張潔平在香港找尋到自己心中的那份新聞理想主義情結，並投身其間，用新聞記錄一座城市的時代變化。在筆者對張潔平的一次訪談中，她曾這樣闡述自己的身份立場與使命<sup>①</sup>：

我來自中國大陸，熟悉這裏發生的故事和它背後的大部分脈絡，而同時我在香港，這國家唯一的新聞自由特區，並在一個不錯的新聞平台享有寫長篇深度報導的機會——這樣的機會在香港媒體可遇不可求。那麼多的重要事件，因為中國大陸的新聞管制留下一片一片的空白；還有民間社會湧現的許多人物，就在境內的封殺和境外全然政治化的解讀中，模糊了本來具有豐富細節的面孔，也模糊掉了所有對於歷史的啟示意義。對於一個新記者來說，身處這樣的位置，很難沒有野心，也很難沒有使命感。當然還有惶恐，每時每刻——擔心自己判斷有誤，在複雜的局勢裏抓不住最要緊的重點；擔心自己功力太淺，

辜負了一段含義豐富卻無人知曉，錯過就不存在的歷史。在我所處的位置，是真的有「新聞是歷史的草稿」的使命感。對我而言，這也是記者這個職業不可替代的意義所在：記錄這個時代，不僅為了今天，也為了歷史。對已經過去的和正在發生的事負起責任，世界才有變好一點點的可能。

2013到2016年，香港社會進入一個空前政治化的時期，媒體上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挖掘與爭論也非常活躍。政治運動必然伴隨着文化運動，這是本地媒體工作者一個非常難得的參與機會。在此背景之下，張潔平和她的《端傳媒》記錄大時代，用這本《香港三年》參與到新香港文化精神的論述中。

2013到2016年，香港社會進入一個空前政治化的時期，媒體上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挖掘與爭論也非常活躍。在此背景之下，張潔平和《端傳媒》用《香港三年》參與到新香港文化精神的論述中。

## 二 風起雲湧的三年

所謂「香港三年」，按照編者的說法，是自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發起非暴力不合作的「佔領中環」倡議始，到旺角發生暴力騷亂止，中間所經過風起雲湧的三年時間。

2013年1月16日，戴耀廷在《信報》發表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明確指出「公民抗命」是殺傷力最大的武器：「以現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會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並不大」，到爭取真普選的「最後時刻」，要有「包括意見領袖在內」的「一萬人以上」，「違法」、「非暴力」、「長期」地「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

對今日的香港年輕人來說，「保衛香港」成為情感動員力量，動員他們投身激進的政治行動之中。他們可以超脫政黨本身的束縛，以非政黨的組合甚至以獨立個體的身份，通過激進的口號和行為在年輕群體裏脫穎而出。

經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頁21）。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後來被稱為「831決定」的香港特首普選框架，明確規定選舉特首的提名委員會人數按照此前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設立，由工商界、專業界等四大界別構成，有意參選特首的候選人必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同時必須符合「愛國愛港」的要求（頁35）。面對這份全面否決「佔中」醞釀期的普選方案，「佔領中環」運動隨即發布新聞稿表示：「今天對話之路已經走盡，佔中必定發生。」（頁37）

然而，原來構想的「佔中」最終沒有發生，八十七枚催淚彈，卻於9月28日催生了由學生帶領的「雨傘運動」——一場歷時七十九天、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的大型佔領運動，給香港的民主運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體驗。七十九天後，12月15日，雨傘運動悄然落幕。「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成效備受挑戰，一度團結一起的公民社會，開始出現分裂的態勢。

2015年6月18日，立法會否決了由北京指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不過，在「831決定」長期有效的政治現實面前，爭取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民主路徑，催生出一個更令人焦慮的問題：「香港，該向何處去？」（頁85）

2016年2月8日晚上，原應喜氣洋洋的大年初一，卻在黑夜中爆發了一場長達十二小時的大型警民衝突。在政府定性為「旺角騷亂」、「旺角暴亂」，而民間宣揚為「魚蛋革命」的命名爭議之中，香港人確

確實實地見證了躁動民意如何催生暴力抗爭。「魚蛋革命」背後，反映的是香港這三年的政治激鬥，其暴力及破壞性對香港的政治文明產生了巨大衝擊；香港的管治方式及能力出現大倒退，警民之間只懂用法律、警棍及政治口號製造仇恨，其結果是，「真正大規模暴動危機，正迫在眼前」（頁212）。

### 三 全方位的分裂

香港，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嗎？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明確指出，在政黨和社群兩個維度上，「政治歸邊也愈加嚴重，尖銳對抗的局面令所有人擔憂：香港社會事實上正在趨向一種撕裂的狀態，而且這種趨向存在着加速演化的可能性」<sup>②</sup>。而在風起雲湧的三年之後，香港所面對的更是全方位的深度分裂。

提出「佔中」倡議的戴耀廷，在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時候如此交心：「最初就是想要劃一條底線，這個底線要比普選『拉倒』更低，要是一個更加無法收場的局面。誰也不想這件事發生，那麼理性的各方應該做的，就是比底線好，而不是向着底線去。在這個過程裏逼着大家去找到共識。」（頁20）而另一位「佔中」關鍵領袖、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亦表達了相類似的想法：「我們守住這個激進的位置，可以讓更激進的人變得邊緣。而我們和他們不同的是，即便我們不談判，也至少不會去攻擊談判的溫和派。」在這一點上，無疑，「佔中三子」的目的是通過一場

運動，讓以他們為代表的溫和的人走出來，站在激進的一邊，才可以讓原本溫和、激進相對立的光譜重新洗牌（頁24-25）。

而現實的走向卻恰恰相反。一場雨傘運動導致香港社會深度撕裂為「黃」、「藍」兩大陣營，且撕裂的口子一旦打開，難以縫合，愈開愈大。在「佔中」者內部，出現了以「佔中三子」為代表的「溫和派」和宣稱革命的「勇武派」。陳健民提出「革命的誘惑」論斷，深刻反思革命論在香港的種種限制，以及「以武制暴」是否可以達到為人民充權的目的，並明確指出雨傘運動在香港沒有升級至革命的可能（頁153-55）；「勇武派」則指責「佔中三子」表現懦弱，李達寧評論三子缺乏徹底「佔中」的決心，面對的是「領袖的誘惑」（頁157-58）。而在《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的分析裏，香港社會出現了三種深度分歧的抗爭路：一是「被動型公民抗命」，即「佔中三子」提出的完全和平、坐着進行且主動接受逮捕的抗命行為；二是「進取型公民抗命」，即非暴力、含衝擊、不主動接受逮捕的抗命行為；三是「勇武型抗命」，即包含攻擊性、「以武抗暴」，盡量避免逮捕的抗命行為（頁172）。在「勇武派」看來，武力革命一方面是面對政權與警察聯手，抗爭者無計可施下被逼出來的產物；另一方面，既冠之以「革命」，則必須涉及抗爭和暴力手段。旺角騷亂和阻嚇侮辱大陸遊客，都被視為勇武有效的例子（頁165）。

對今日在香港年輕人來說，「保衛香港」成為情感動員力量，動

員他們投身激進的政治行動之中。他們可以超脫政黨本身的束縛，以非政黨的組合甚至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單單通過激進的口號和行為，就可以在年輕群體裏脫穎而出。如何激進？用本土派代表梁天琦的話說，是「沒有底線的」（頁250）。在激進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主導的旺角騷亂中，示威者不顧人命地投擲磚頭，在黑夜中四處點火。此前，他們亦不時在屯門、沙田發起所謂的「光復行動」，以惡鬥的姿態驅逐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這樣的激進行動，帶來的結果是梁天琦在首次代表本土民主前線參加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時，獲得15%的高票，位列第三（頁249）。上升到政黨層面，就是過去捆綁泛民主派支持者於同一陣營內的「泛民統識」已經逐漸瓦解，分裂成為常態。以本土民主前線為代表的激進派，不僅僅是單純靠瓜分選票生存，而是已經實質發展出其獨有的群眾組織，放棄吸納支持泛民的保守溫和選民（頁226）。

#### 四 三十年的範式轉移

中港政治的角力，本土與家國，抗爭與民主，改良與革命，這些是今日香港政界的熱門話題，也同樣是1970年代學界熱烈討論的話題。1970年代中期，香港的大專學界曾就上述這些問題劃分為兩派：一、提倡認同中國的國粹派；二、強調不可盲目認同中國，支持本地認同、本土抗爭的社會派。社會派指出，要批判地認識中國，以

中港政治的角力，本土與家國，抗爭與民主，改良與革命，這些是今日香港政界的熱門話題，也同樣是1970年代學界熱烈討論的話題。但是抗爭和爭取民主運動的範式已經徹底轉移。

《香港三年》收錄的文章大多聚焦香港內部，從不同角度對運動的參與者，包括「佔中」發起人、廣場的學生、街頭年輕人、前線的警察、參與活動的港漂進行白描式的勾勒。比較遺憾的是，這部分記錄缺少了北京和大陸人士的聲音。

行動改革香港：「中國是我們的祖國，正如母親之於我們有着親切的感情……突然母親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仔細端詳，這種莫名的喜悅實非外人所能道……我們強調認識中國要『是其是，非其非；愛之深，責之切』。」（頁318）

四十年後的今天，當年的社會派紛紛成長為後來的泛民主派，在香港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新崛起的本土派則開始批判泛民的思考框架過於認同大中華，對香港本土沒有足夠的重視。港大學生會連同另外三所大學的學生會，亦已發動公投成功退出主張「建設民主中國」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頁320）。「是其是，非其非；愛之深，責之切」這樣的論述再不會出現在今時今日批判者和抗爭者的視野中。民主黨紀律委員會主席、支聯會副主席麥海華接受《端傳媒》採訪時直言：

現在年輕一代要求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乎認為民主派也是在阻礙民主發展，搞了數十年，民主回歸也是垃圾，但是他們沒有策略，是情緒化，認為只要老一輩都走掉就好了。……現在的情況則是太情緒化了，太過希望推倒一切，如果連民主派所建立的少數否決力量也被打跨〔垮〕，就會被建制派壟斷議會，到時甚麼也沒辦法，香港就會走新加坡的路，高壓操控，不可翻身。（頁323）

今天的香港，政治上討論的話題依舊是過去的話題，但是抗爭和爭取民主運動的範式已經徹底轉移。在政治訴求上，過去三十年所

追求的「民主回歸」已經轉向為本土主義的「獨立自決」；在抗爭手法上，也從過去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轉向為「勇武抗命」；在組織領導上，則由精英主義轉向為扁平化的民粹主義<sup>③</sup>。至於新的路線又如何，在歷史的脈絡裏找尋到根源，這還需要更加深入的思索。

## 五 另一方的立場

《香港三年》所收錄的文章，絕大多數都聚焦香港內部，從不同角度對運動的參與者，包括「佔中」發起人、廣場的學生、街頭年輕人、前線的警察、參與活動的港漂進行白描式的勾勒。然而比較遺憾的是，這部分記錄缺少了北京和大陸人士的聲音，只有張潔平的「攤牌」系列文章裏零星地提到對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的訪問。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這樣的記錄是不夠完整的，當缺少對事件所有參與者的分析時，就難以讓我們把握北京的政策制訂細節和背景，以及其背後的政治邏輯。

我們目前可以知道的是，在北京看來，行政長官是鞏固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最為重要的紐帶，因此必須牢牢把握住對行政長官和香港政府主要官員的最終任命權，確保香港的行政主導權只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中央政府作為國家主權的代表，對於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是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導權的。中央對於其轄下的一個享有相對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域行將舉行的特首普選，作出必

須是愛國愛港者當選的要求，是再具有正當性不過了。」<sup>④</sup>如果進行普選或過早進行普選，就很有可能令民主派掌握權力，取得立法會多數議席，甚至當選行政長官，這便無法保證所選出來的特區政府必然跟中央政府意願相符。如果一旦因此引發政治對立甚至經濟倒退、社會混亂，中央政府就將背負「一國兩制」失敗的罪名。因此，在香港落實特首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規定，以保證真正愛國愛港者當選。這是一個不容退讓的原則問題。中央不可能作無原則退讓」<sup>⑤</sup>。

這種從中國利益角度出發的國家論述，最典型的代表來自於強世功的分析。他在一組「香江邊上的思考」論文中明確指出：「香港政治轉型的動力無疑來源於中央，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的香港回歸……沒有中央政府推動的香港回歸，就沒有香港的政制發展和民主改革。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政府是香港的民主派」；「香港民主化問題也是國家建構中的核心問題，在這塊沒有英國人統治的英國殖民地上，使得國家建構中的政治認同變得異常敏感脆弱」；「若要保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同時又要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一國與民主之間達到適度的平和」<sup>⑥</sup>。作為中國官方的智囊，並且參與草擬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大部分的內容，強的論點無疑代表着中國官方的香港論述，嵌套在「中國崛起」的大框架之中，用國家主權觀去包裹香港問題。

然而在這樣的國家主權觀的包裹之下，筆者更加想知道北京一系列對港政策出台的細節如何。例如，這裏面除了我們知道的強世功之外，又有哪些學者、智庫機構、行政部門參與到政策的具體制訂當中？在數輪的研討定案過程中，曾有過哪些議題的爭論？在過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裏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在學者分析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吸納（incorporation strategy）這三個層面裏<sup>⑦</sup>，是否有過波折和變化？如果有波折，又是何種力量和政治考量導致政策的改變和政治維度的收緊？對於新聞媒體而言，這一部分的採訪、記錄和追蹤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惜的是，本書在這一維度上並未有所涉及。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在社會運動當中，參與者為了推動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常常會使用甚至發明新的抗爭策略，但是，反對者也會相應地使用反制策略以消弭和化解運動的影響，這種戰術適應（tactical adaptation）通常並不以強硬姿態的模式出現，而是軟性的、有極強針對性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破壞運動的社會影響。當香港這場民間佔領運動波譎雲詭之時，反對者也相應地組織了一場大型的反佔領運動，並且通過媒體廣為宣傳。在事後的推演上，我們看到：如果「佔中」運動的領導者發動全民公決的民間投票，冀望在民間層面喚起更多的支持和參與，運動的反對者也可以發起類似的全民簽名運動，並且獲得在另一個論述層面上的民間支持；如果參與者最終採取激進的形式，將運動推向激進化，

在過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裏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在學者分析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吸納這三個層面裏，是否有過波折和變化？何種力量和政治考量導致政策的改變和政治維度的收緊？這一部分的採訪、記錄和追蹤是非常有必要的。

相信反對者也會提升管制等級，甚至不排除引入「強力部門」的參與。那麼，從普通參與者的角度出發，又是哪些群體及個別人士加入到藍營之中，熱烈地反對佔領運動？他們為何會有如此強烈的反對訴求？他們的生命故事如何？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他們對於未來香港又有怎樣的期望？

此外，有一批特殊的「中生代」香港人的聲音，長期以來一直被忽略——這就是在香港各大學從事教研工作的內地學者。這一批學者的共有特徵就是普遍成長於內地，在北美最好的大學接受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並在香港的大學裏長期任教，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裏經歷過香港回歸後的諸多變化。他們對香港社會、政治發展的關注，雖然在立場上更加糅雜，但在研究方法上卻更加嚴謹。

譬如，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吳曉剛，長期主持「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The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旨在追蹤香港社會和經濟的變化及其對個人的影響。研究人員分別在2011、2013和2015年完成了三期調查，抽樣時間正好與「佔中」運動時段重疊，因此在樣本和數據分析上也更加具有代表性<sup>⑧</sup>。同樣來自於科大社科部的蔡永順，長期關注社會運動，新近出版一部有關「佔中」運動的專著，討論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如何得以持久延續<sup>⑨</sup>。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的閻小駿，則從政治學的角度提醒我們「一念起關山」——新一代中國政

治精英對香港的看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北京的治港政策<sup>⑩</sup>。

## 六 結語

社會抗爭運動從興起到最後的消退，其結果一般而言不外乎以下幾種：

第一種：社會運動發生轉化。街頭的抗議示威轉為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運動參與者被吸納成為體制內的壓力團體或政黨。

第二種：社會運動制度化。其結果使得社會運動不再是某種異己的、被排斥的非正常行為，而是被整合成為一種自我持續化、常態化、普遍化的民主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社會運動成為一種被政權認可的政治表達和運作方式，而社會不同階層也願意容忍抗議對日常秩序的擾亂。在一個政治條件開放的社會中，社會運動全面制度化，就會形成所謂的「社運社會」(social movement society)的普遍現象<sup>⑪</sup>。

第三種：社會運動徹底衰退。運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動員的風潮卻逐漸減退，參與者開始產生各種失望的負面情緒，組織內部甚至出現分裂，同時旁觀者也不再給予積極的響應。其結果是運動偃旗息鼓，運動所倡導的議題也不再引起注意。

第四種：革命的爆發。由於社會運動無法被制度化，反而走向極端，一些微小的抗議事件逐漸累積並讓運動演化成為革命的形態，最終促成改朝換代的結果。但是革命只有在特定的政治條件之下才會形

一批特殊的「中生代」香港人的聲音，長期以來一直被忽略——這就是在香港各大學從事教研工作的內地學者。他們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裏經歷過香港回歸後的諸多變化，對香港社會、政治發展的關注，雖然在立場上更加糅雜，但在研究方法上卻更加嚴謹。

成，譬如在一個封閉的威權政體之下，由於國家無法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爭渠道，失控的抗議事件就有可能導致一場大革命；而在民主國家中，這一類型的事件最多發展成為無秩序的暴動或者騷亂，並不會對政體本身產生衝擊。

具體到香港的社會情境中，很多分析會把雨傘運動當成是新時代的開始，在本土身份發展成型的基礎之上，一整個跨越不同年齡、階級和身份，攜手抗爭的「雨傘世代」已經集結，宣告着「香港政治冷漠時代的終結」<sup>⑩</sup>。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根據《香港三年》裏一個片段的記錄，「佔中」運動之後，一位曾經激昂的運動參與者不無傷感地發現，當時一起流淚一起抗爭的戰友，「感情多少有點淡掉」。運動期間，「大家有共同理念而留在佔領區，但回歸現實，大家始終各有各忙，性格可能合不來，有的人感情深了，也有些淡了」（頁114）。

不同立場、不同態度、不同行為、不同訴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社會能否找到一條獨特的民主路，在不與「一國」原則對抗的前提下活出其尊嚴？這便是「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所面對的挑戰（頁164）。

### 註釋

① 嚴飛：《我們的香港——訪談這一代香港文化人》（香港：文化工房，2014），頁185。

② 嚴飛：〈香港：這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嗎？〉，《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3年12月號，頁120。

③ Malte P. Kaeding, “Resisting Chinese Influence: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Current History* 114, no. 773 (2015): 210-16; “The Rise of ‘Localis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8, no. 1 (2017): 157-71.

④⑤ 張定淮：〈愛國愛港者治港原則絕不能動搖〉，《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年8月23日。

⑥ 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頁174、178、182-83。

⑦ Brian C. H. Fong,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13 March 2017, <https://doi.org/10.1177/0097700417691470>, 1-34.

⑧ 有關「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的詳細介紹，參見Wu Xiaogang,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 Research Designs and Data Overview”,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 issue 2 (2016): 162-84。

⑨ Cai Yongshun, *The Occupy Movement in Hong Kong: Sustaining Decentralized Protest* (London: Routledge, 2016).

⑩ 閻小駿：《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香港：三聯書店，2015）。

⑪ David S. Meyer and Sidney G. Tarrow, ed.,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⑫ 鄭煒、袁瑋熙：〈「雨傘運動」：中國邊陲的抗爭政治〉，《二十一世紀》，2015年2月號，頁31。

不同立場、不同態度、不同行為、不同訴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社會能否找到一條獨特的民主路，在不與「一國」原則對抗的前提下活出其尊嚴？這便是「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所面對的挑戰。